

# 他者之镜：古伯察《中华帝国纪行》中的南昌府印象

吴雪

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，江西南昌，330013；

**摘要：**《中华帝国纪行》是法国传教士古伯察于 19 世纪环游中国后撰写的游记，在西方影响深远，为理解当时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提供了重要文本。南昌府是古伯察笔下印象尤为深刻的城市，他在书中对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多方面作了细致记录。以古伯察在南昌府的行程路线为线索，从他者视角梳理古伯察所描绘的南昌形象，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中折射的中西文化差异及其形成的历史语境。

**关键词：**古伯察；交通路线；南昌府；《中华帝国纪行》

**DOI：**10.64216/3104-9672.25.03.024

古伯察（Régis-Evariste Huc，1813～1860 年），法国传教士，汉学家，通晓汉、满、蒙、藏等多种语言。1844 年，他与秦噶哗（Joseph Gabet，1808～1853 年）前往蒙古、西藏等地布教，后遭押解返回中国澳门地区。途中见闻著成《中华帝国纪行》一书，内容涵盖西藏、四川、湖北、江西等地，涉及当时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诸多方面。该书出版后，先后被译为多国文字，欧洲主流期刊纷纷刊出书评，“古伯察首度发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”<sup>[1]</sup>，甚至被一些传教士视为认识中国的“启蒙书”，足见其在 19 世纪西方中国形象构建中的重要影响。

南昌府是古伯察途经江西的重要一站。他在书中对南昌的城市风貌、交通网络、商业活动及风俗文化等作了细致描绘。本文通过梳理古伯察在赣的行旅轨迹，从他者视角分析其对南昌的观察与记述，以期进一步揭示 19 世纪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。

## 1 古伯察南昌之行的行旅路线

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间（1841～1846 年），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及其教友完成了一次环中国之旅，其行程可分为两阶段：第一阶段为北上赴藏区传教，自以 1841 年 2 月由珠江北上，经江西、湖北、河南、河北、内蒙古、宁夏、甘肃等地进入西藏；第二阶段自 1846 年 3 月从拉萨被押解南下，经四川、湖北、江西、广东，同年 10 月抵中国澳门地区返法<sup>[2]</sup>。

在这次旅行中，古伯察曾两次途经南昌府。南昌自南唐升格为府，“辖 7 县 1 州：南昌、新建、丰城、进贤、奉新、靖安、武宁、宁州”<sup>[3]</sup>。南昌府地处赣江流域水运枢纽，拥有通达的水系网络。尤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，随着新通商口岸的开辟，导致货物运输流向的

变化，形成了“以九江为中枢的赣州—吉安—樟树—南昌—吴城—湖口—九江的基本框架”<sup>[4]</sup>。古伯察自湖北抵鄱阳湖北端湖口，横渡鄱阳湖后，循赣江南下抵达南昌。

在南昌期间，古伯察受到知府与巡抚的礼遇，不仅获接见，还为其配备护卫与两艘平底帆船，沿途待遇优渥。此次南昌之行，不仅展现了晚清内河交通的网络特点，也折射出中西接触初期地方官员与民众对西方人的复杂态度。

## 2 古伯察眼中的南昌府印象

南昌府是古伯察一行人在江西停留的主要城市，优越的地理位置、发达的水路运输网络以及繁荣的商业贸易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古伯察眼中，南昌府是最为著名的城市之一，“全中国最像样的一座城市”<sup>[5]</sup>。

### 2.1 鄱阳湖：水运航道的枢纽、名副其实的“内海”

鄱阳湖位于江西北部，南纳赣江、抚河、信江等多条河流，北经湖口注入长江“形成一个完整的以鄱阳湖为中心的成扇骨状分布的水系”<sup>[6]</sup>，是江西水运网络的枢纽。古伯察一行自湖北沿长江航行至湖口进入鄱阳湖。他将湖泊形容为“它的北端犹如一条长舌伸出来与扬子江相遇”<sup>[5]</sup>，并在横渡时感叹水面浩瀚如海：“为期两天的航行中，我们基本望不见陆地……分明是海洋，而非湖泊”<sup>[5]</sup>称其为名副其实的“内海”。从湖口前往南昌有水陆两路，横渡鄱阳湖后经赣江即可直达南昌城。古伯察在书中写道，“我们本可以坐船直达江西省城的，因为驶离鄱阳湖之后，就进入到一条江口，它能直抵南昌城下”<sup>[5]</sup>，由此可推断他们选择了走鄱阳湖——赣江航道到南昌这条便捷的水路。

此外，古伯察对当时鄱阳湖上千帆浪击的航运景象

更是大加赞美,“数不清的舟楫在鄱阳湖上破浪扬帆,百舸争流”<sup>[5]</sup>。这一景象与清代鄱阳湖的航运地位相符,作为漕运、客货与商贸运输的核心通道,鄱阳湖串联起。“汉口—吴城—樟树—赣州—大庾岭—广东”<sup>[6]</sup>的南北商路,承载巨大运输量,因而呈现出千帆竞发、舟楫不绝的壮观场面。

## 2.2 街道整洁、商贸繁盛的城市印象

在行经中国多座城镇后,古伯察常批评其街道狭窄、脏乱拥挤,但对南昌府却赞誉有加。用“干净宽敞”来表达自己的直观感受。这背后与明清时期南昌棋盘式的规整布局有关,此期街道的整体结构呈现出棋盘式格局,大街疏阔、小巷有序,整体呈现出整洁而通达的城市面貌。

此外,古伯察也注意到城内商业的繁盛。“店铺与货栈排列整齐,装潢气派”<sup>[5]</sup>,并指出这种繁荣与南昌优越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。“所有南来北往的货物都得经过南昌府”<sup>[5]</sup>。对外,南昌北接鄱阳湖与长江,南通赣江—大庾岭—广东;对内,“传统的商路以赣江—鄱阳湖为主径”<sup>[5]</sup>,形成贯通省外的水运网络。完善的交通条件有效促进了商品流通与商业集聚,使南昌成为江西乃至南北贸易中的重要枢纽。在古伯察笔下,整洁的街道与繁华的市集共同构成南昌“最像样的城市”形象,也反映出交通布局与商业活动在城市发展中的紧密关联。

## 2.3 舒适奢华的水上帆船之旅

古伯察一行人进入江西后主要依靠水路乘船行进。赣鄱地区的造船业历史悠久,“明至清前期,江西的造船业随着漕运和商货运输的更加繁盛”<sup>[9]</sup>,这一时期的船只船型多样、属具完备,在性能与工艺上均体现出较高水平。古伯察对在南昌及南下途中的乘船体验给予高度评价,他认为相较于中国北方车马的车马出行,南方的乘船出行更为舒适。他特别指出:“中国的交通工具要么累人,要么危险……官船是最佳的出行方式,而且舒适”<sup>[5]</sup>。这一评价源于两方面:一是船只的制造与装饰技艺精湛,古伯察赞叹在南昌所乘平底帆船“装备得如此舒适”<sup>[5]</sup>,“有装饰奢华、精美整洁的卧室……可谓世间罕见,效果极佳”<sup>[5]</sup>,船内装饰奢华、雕刻精美,给他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。明清时期,江西肩负着漕粮供应及运输的重任。不仅造船工艺复杂、难度大,所制造的船只兼具容量大、坚固且耐用的优点<sup>[6]</sup>。二是船型丰富多样。古伯察在鄱阳湖观察到,“用途不同,

船型也不同;目的不同,帆式也不同”<sup>[5]</sup>。说明当地已能根据不同航运需求制造相应船只,可见江西舟船品类之丰富。

便捷、舒适的水上帆船之旅,为古伯察塑造了深刻的出行记忆。诚然,不同的交通工具所带来的身心体验会影响行旅者沿途的感受,进而间接影响着行旅者脑海中城市印象图式的构建。因此,乘坐精美官船的经历,无疑成为古伯察将南昌府视为“最像样的城市”的助推剂。

## 3 古伯察南昌府印象所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

19世纪,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已从理想化转为以自身文明为标准的评判。来华者在文化差异乃至对立的背景下,对其所见进行多样解读。古伯察对南昌府的观察与印象,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与中国现实交织中形成的。

### 3.1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审视与对比

西方对中国的认知,往往映照出其自身的文化视角与时代语境。西方中国形象生成的过程,与不同时期中国国家的实力和地位有关<sup>[8]</sup>。古伯察来自法国,18世纪欧洲曾盛行“中国风格”<sup>[9]</sup>,但随着“礼仪之争”和马戛尔尼访华,19世纪的西方叙事普遍转向负面,将中国描绘为落后停滞的帝国。多数来华者带着文明优越感,选择性呈现其腐朽一面,强化了这一形象。

古伯察虽身处同一时代,其观察却体现出不同的平衡。他在《中华帝国纪行》中明确批评孟德斯鸠等前人对中国的刻板丑化。“孟德斯鸠用最黑暗的颜色,把中国人描绘成一个可悲的、怯懦的民族,在残酷的专制君主统治下卑躬屈膝”<sup>[5]</sup>。他认为其描述夸张失实。在行旅中,他既记录社会现象,也注意到中国人的品质,如在翻越险峻的高山时,那些轿夫们却展现出无比的沉着,“却哈哈大笑,讲笑话,讲关语”<sup>[5]</sup>。这种相对平实的笔触,使其记述区别于同时代常见的片面批判。

总之,尽管身份、文化与时代背景会深刻影响旅行者的观察与叙述,导致他们的记录常带有主观色彩与文化偏见,但古伯察却在批判与过度美化之间寻求平衡点。即使其旅行承载着西方扩张与传教的时代使命,但他并未陷入简单的文明对立或理想化描绘,而是力求基于实地见闻,在文化差异中寻求客观理解。因此,他的记述超越了对中国单纯的优劣评判,体现出一种在碰撞中追求真实、在差异中保持反思的观察姿态。

### 3.2 地域分野下的南北差异观察与比较

古伯察的环中国旅行跨越南北,显著的地理与文化

差异同样为其带来了不同的认知体验。在南北交通方面,南方水系发达,舟船成为主要出行工具,古伯察对其便捷与舒适赞誉有加。“这样的旅行的确是一次逍遥游。你可以完全不受干扰,彻底拥有这份宁静”<sup>[5]</sup>,反观北方陆路出行则颇有微词,“人们出行大多取道陆路,可是途中事故频发,常常是车翻人伤”<sup>[5]</sup>,认为旅行更为艰辛。这种体验对比,不仅影响其对各城市的印象,也使其将交通工具视为理解地方文化的载体。

古伯察敏锐注意到南北方人的性格与气质差异。“后者虽然皮肤稍白一些,而且柔弱一点,可是五官却更为清秀,穿着更为考究,此外还更加健谈,更加俏皮”<sup>[5]</sup>,“他们皮肤黝黑……充满阳刚之气,这一切与中国南方人形成强烈的反差”<sup>[5]</sup>。在他看来,北方人如轿夫般坚韧直率,如“抬肩舆的轿夫是汉人之中最地道的一类人之一”<sup>[10]</sup>;南方人灵活、健谈、好讲礼数。这些描述虽带有文化比较的色彩,但是在融入切身经历的基础上所勾勒出来的印象,相较于当时西方常见的刻板评价,显得更为具体与平实。

南北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别也体现在他的记述中。西北城市如多伦诺尔被形容为“大片简陋和分布不整齐的住宅区……街道中只会看到污水坑和垃圾堆”<sup>[11]</sup>,而南下至邛州一带,则见到“道路变得越来越宽,村庄越来越多,住房建造得越来越好……给人以高度文明的印象”<sup>[10]</sup>。这种空间移动中的面貌转换,揭示出当时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均衡。

古伯察通过这些差异性观察,进一步指出欧洲对中国不仅存在描述缺乏真实性的问题,还有“整齐划一”式认知误区<sup>[5]</sup>,“他们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高度统一的”<sup>[12]</sup>。他认为,中国并非刻板印象中高度同质的帝国,而是充满地域多样性。其记述既是对南北风貌的真实呈现,也体现了他在整体把握与细节观察中力求客观的立场,从而超越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简单化、片面化的叙述模式。

#### 4 结语

古伯察的环中国旅行发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,此时清政府已丧失与西方国家平等对话的地位。相较于当时许多怀抱西方先进文化中心论的来华者,古伯察力求以相对客观的视角呈现中国,并有意识地避免陷入一味赞颂或贬抑的常见倾向。古伯察在南昌府的观察涵盖了交通运输、商业贸易、农业经济与民俗文化等方面,较为客观且真实地反映出明清时期该城的城市风貌、经济发展与水运状况。正如他在书中所指出,“欧洲出

版的很多有关中国的著作……书里所描写的中国其实并不存在,不过是凭空臆想出来的”<sup>[10]</sup>。古伯察强调唯有亲身考察才能接近真实,其记述也因此呈现出更为平衡的图景。对比其他传教士,他并未仅聚焦于中国社会的落后层面,而是以兼具批判与欣赏的态度进行观察,并最终赞誉南昌府为“全中国最像样的城市”。通过古伯察的客观描述,我们既能窥见清代南昌的社会风貌,也可进一步理解19世纪中西接触过程中,一位力图超越文化偏见的外来者所构建的中国形象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[1] 潘玮琳. 19世纪的表述中国之争:以密迪乐对古伯察《中华帝国纪行》的批评为个案[J]. 史林, 2010, (04): 141-149+190.
- [2] (法) 古伯察. 鞑靼西藏旅行记[M]. 耿昇, 译. 北京: 中国藏学出版社, 2012: 35-37.
- [3] 梁洪生, 李平亮. 江西通史清前期卷9[M]. 南昌: 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08: 68.
- [4] 赵树贵, 陈晓鸣. 江西通史晚清卷10[M]. 南昌: 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08: 79.
- [5] 古伯察. 中华帝国纪行(下)——在大清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历险[M]. 南京: 南京出版社, 2006.
- [6] 胡迎建. 赣鄱水运文化史[M]. 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9: 2.
- [7] 沈兴敬. 江西内河航运史(古, 近代部分)[M]. 北京: 人民交通出版社, 1991: 103.
- [8] 赵凤玲. 西方中国形象演变的历史图景——13—20世纪前半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[J]. 中州学刊, 2022, (12): 141-145.
- [9] 沈福伟. 中西文化交流史[M]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, 1985: 425.
- [10] 古伯察. 中华帝国纪行(上)——在大清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历险[M]. 南京: 南京出版社, 2006: 8.
- [11] (法) 古伯察. 鞑靼西藏旅行记[M]. 耿昇, 译. 北京: 中国藏学出版社, 2012: 42.
- [12] 庞希云, 钱林森. 中国万花筒: 古伯察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塑造及其传教士立场[J]. 华文文学, 2014, (03): 42-48.

作者简介: 吴雪(1998——), 女, 汉族, 陕西安康, 硕士研究生, 研究方向: 汉语国际教育,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。